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 农民价值观的变化

沈 冰 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生产者的劳动和经营积极性，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乡镇企业应运勃兴，对改变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商品生产、改变农村面貌日益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改变传统农村社会和农民思想奠定了物质基础。农村经济的空前活跃对农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带来什么变化，笔者试图通过社会调查，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一九八五年三月，我在长江三角洲选了一个集镇和一个农村作调查，它们是碧溪集镇和欧桥村。现在先把这两个地方作一简单介绍。

碧溪乡和欧桥村均位于江苏省南部苏州地区，前者属常熟市管辖，后者属沙洲县管辖。一九七九年后兴修公路，交通比较发达。地理位置也比较好，离上海只有九十至一百公里，周围有苏州市和无锡市。

碧溪原是一个小乡，一九五八年由四个乡合并组成碧溪人民公社。一九八三年四月，撤消人民公社，恢复了乡政府。碧溪乡下辖二十二个村（即农业生产大队）和一个集镇，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有二万七千七百六十五人。人均只有八分地，属人多地少地区。长期以来“左”的政策，把所有劳动力都捆在有限的耕地上。一九七〇年前，农民人均收入不到一百元，是一个穷乡。一九七九年以来，农业实行改革，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转移到副业生产上的有种、养、编、织、劳务、运输、加工等二十多个行业。近几年乡镇工业发展很快，目前已是村村办工厂，建成了以针织为主，机械、建材、电器、塑料并举的六十一个企业。一九八四年全乡一万八千多劳动力中，从事工副业生产的劳动力占百分之六十九点六，农业劳动力只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四。

碧溪集镇是碧溪乡政府所在地。该集镇的特点是全镇一九八三年共有六千多人，但是本镇居民只有七百五十六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十二点五，而农民工却占百分之五十点八共三千零五十人，他们都是居住在周围农村的农民，白天骑自行车到工厂做工，晚上回家，有的还帮助家里种自留地或搞副业生产。此外，镇上还有农业人口一千四百人，居住在镇区周围，非镇区学生八百人。集镇上的工厂有乡办的，也有村办的，它们吸引着碧溪乡的农民。乡镇企业用于集镇建设的投资五年内达四百七十三万元。这里有工厂、商店、卫生院、文化馆、中小学、饭店、招待所以及其他服务行业，还修建了十公里乡间公路。昔日只有一

条不到二百米长小街的交通闭塞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小集镇，现已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小镇。碧溪集镇的巨变是同碧溪乡一九七九年以来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

欧桥村一九八四年共有一千九百七十九人，长期以来，由于田少人多，经营单一，是富不起来的贫穷村。一九七五年人均集体分配只有一百零五元，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住茅草屋，女的不嫁到欧桥村，使村里二十多个光棍找不到对象。由于贫困，村里有二十多户迁居他乡。一九六五年生产大队把八户织手套的社员组织起来办了一个生产劳保手套的小企业。由于“左”的路线的干扰，中间几经波折，发展步子很慢，直到一九七九年政策比较明确后，欧桥村的工业发展才直线上升。一九八四年全村办了七个工厂、一个运输队、一个集体商店和农业生产服务站。工农业的发展改变了欧桥村的落后面貌，现在村里有一家一千一百个座位的影剧院以及可容纳一千七百七十人的泡沫塑料铺地的灯光球场，还有商店、照相馆、理发室、饭店、书厅、宾馆等。平均每二十户人家有一部公用电话。

现在从三个纵向数据(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和收入结构)来看这两个地方的变化趋势。

表一 碧溪乡经济结构的变化
(1966—1984)

年份	总产值 (万元)	农业 (%)	工业 (%)	副业 (%)
1966	638.0		10.9	
1970	615.0		20.7	
1975	572.0			
1979	3,044.0	25.8	71.5	2.7
1980	4,446.0	14.4	76.4	9.2
1982	5,977.0	14.8	79.2	6.0
1984	10,212.0	10.9	82.7	6.4

数据来源：碧溪乡政府

表二 欧桥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1956—1984)

年份	总产值 (万元)	农业 (%)	工业 (%)	副业 (%)
1956	29.5	94.9		5.1
1966	46.3	56.8	38.9	4.3
1979	321.0	15.2	72.0	12.8
1982	1,017.0	4.5	80.9	14.6
1984	1,820.0	3.6	80.0	16.4

数据来源：欧桥村政府

表一和表二说明，碧溪乡和欧桥村经济结构取得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几年中，农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工业比重迅速上升。欧桥村一九八四年农业比重只有百分之三点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九年增长了五倍多。碧溪乡一九八四年农业比重为百分之十点九，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九年增长将近三倍。欧桥村副业增长速度也比较明显。总的说，这两个地方已经突破了几年来农村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生产概念和生产方式，成为工业乡、工

业村。这种变化在劳动力结构上也有所反应。

表三 碧溪乡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

年 份	农 业	工 业	副 业
1960	92.8	1.1	6.1
1970	88.4	5.3	6.3
1979	57.6	38.0	4.4
1982	44.8	53.2	2.0
1984	30.4	62.3	7.3

数据来源：同表一

表四 欧桥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

年 份	农 业	工 业	副 业	其 它
1956	95.3		3.4	1.3
1966	86.5	8.7	3.0	1.8
1979	58.7	38.8	1.8	0.7
1982	30.8	56.0	10.2	3.0
1984	13.8	71.2	10.4	4.6

数据来源：同表二

碧溪乡和欧桥村的劳动力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两个地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直到八十年代，农业劳动力比重才急剧下降，低于工业劳动力比重，一九八四年碧溪乡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力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四，欧桥村占百分之十三点八，后者的发展速度比前者更快。那么这两个地方收入情况怎样呢？

表五 碧溪乡收入结构的变化 (%)

年 份	人均总收入 (元)	农业 (%)	工业 (%)	副业 (%)
1954	88.0			
1958	90.0			
1978	172.5	46.1	43.5	10.4
1980	274.5	47.9	43.7	8.4
1982	383.0	50.5	47.0	2.5
1984	768.0	35.0	46.0	19.0

数据来源：同表一

表六 欧桥村收入结构的变化 (%)

年 份	人均总收入	农业 (%)	工业 (%)	副业 (%)
1956	73.0	92.0		8.0
1966	85.0	63.0	17.0	20.0
1979	35.7	37.0	40.0	23.0
1982	740.0	17.0	49.0	34.0
1984	1,010.0	18.0	46.0	36.0

数据来源：同表二

以上数据说明，欧桥村经济发展速度比碧溪乡快，收入上升幅度也大。一九八四年人均收入达一千零一十元，碧溪乡为七百六十八元。前者来自农业的收入占百分之十八，后者占

百分之三十五。但是，总的说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都比较快。一九七九年以后工副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从而由以农业收入为主，转为以工业收入为主。

以上一些结构性变化是现阶段中国农村出现的新动向，它不仅对农村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而且波及城市，并对城乡关系提出新的要求。

二

碧溪集镇随机抽查的五十名农民工均来自碧溪乡所属的农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碧溪乡的情况。欧桥村抽取四十三名农民工。从年龄上看，他们大多是年轻人。碧溪镇上的五十名农民工最年轻的十九岁，最大的六十四岁。其中百分之五十二在十九至二十九岁之间，百分之四十在三十至四十九岁之间，只有百分之八在五十至六十五岁之间。从文化上看，最年轻的年龄组文化程度最高，大都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文盲三人，都是在四十岁以上年龄组。欧桥村的情况和碧溪集镇相似，但他们的年龄更为年轻。最年轻的十六岁，最大的五十六岁。其中十六至二十九岁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五十至五十九岁的仅占百分之四点六。他们的文化水平也比碧溪各低一些。中学以上的占百分之六十，而碧溪占百分之六十九。最年轻年龄组的文化程度较其它组为高，在十六至二十九岁年龄组内中学水平的占百分之七十七。

由于欧桥村的工业发展速度较碧溪乡快，因而收入也高。每人每月最低收入为六十元，最高收入二百二十元，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收入在九十至一百零九元之间，而碧溪镇最低收入为三十五元，最高收入九十二元，百分之五十九的收入在四十至五十九元之间。

以上说明，在农村工业生产中首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是一批有文化的青年人。工厂经过考试，根据择优录取的办法来选择进厂的农民工。这一批人也许可以代表农民中新的一代人。他们和传统农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变化

碧溪镇农民工已婚的三十五人中，有百分之八十建立了小家庭，和父母兄弟分居。欧桥村已婚的二十一人中，有百分之六十二建立了小家庭。

农业承包责任制的执行，解决了集体“吃大锅饭”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家庭内部兄弟姑嫂间的分配问题。因此，分家愿望日益增长，然而，分家要有条件。近几年农民收入增加了，他们首先把这笔钱用来盖新房，分家也就成为可能了。分家后，父母有单独过的，也有在几个儿子家里轮流住的，有的则固定住在一个儿子家里。

小家庭制度代替了传统的大家庭制度。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所谓“孝悌为立身之本”以及作为封建帝王控制中国最基层细胞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随着小家庭的建立而削弱。

传统大家庭至少有三大权：经济权、婚姻权和生育权。通常由一家辈分最高的长者掌管。看来经济权是为了维护家长制的统治，婚姻权是为了建立社会关系网，生育权则是为了以家族为中心繁衍后代。三者有其内在联系。小家庭的建立首先在家庭内部出现经济权的转移。夫妻两口有权支配家庭经济，他们的发言权也就大了。因此，小家庭制度的建立冲击了几千年的家长制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

（2）婚姻态度的变化

碧溪镇随机抽样的五十名农民工中，有三十五人是自由恋爱的，六人是包办的（其中两

人在十九至二十九岁年龄组内)。欧桥村的婚姻情况和碧溪相比较,传统成分更多些。随机抽样的四十三人中,有十四人的婚姻是包办的(其中七人在十六至二十九岁年龄组内),十一人是自由恋爱的(见表七)。看来,社区越大,社交的机会也越多,为青年找对象提供了条件。

表七 婚 姻 情 况 (单位:人)

	碧 溪	欧 桥
包 办	6	14
自 由 恋 爱	35	11
上述两者之间	4	3
无 对 象	5	12
没 有 回 答	0	3

经济权的转移,使家长的权威、地位随之下降,从而削弱了婚姻的包办。传统家庭子女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父母通过婚姻关系,来建立社会关系网。因此,结亲双方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就成了传统婚配的重要条件。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封闭式小生产经济。碧溪镇的农民工来自碧溪乡的下属村庄,在生产上不仅冲破了家庭的小天地,而且跨越了以本村为单位的生产形式,为青年男女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从而婚姻自主的要求随之增长。这两个地方的包办婚姻,其内容和传统式的包办已有所不同,它要经过双方接触、同意才确定下来。

(3) 生育观的变化

碧溪镇主张只生一胎的有十八人(大多是在十九至二十九岁年龄组内的),只有三人表示最好生男的,却有二十人表示生男生女无所谓(大多数也是在十九至二十九岁年龄组内)。欧桥村有三十六人表示希望生二胎,只有三人表示最好生男的,有二十一人表示生男生女无所谓(见表八、九)。生育态度在层次高一级的乡比村的变化更为明显。

表八 对生育的态度(碧溪) (单位:人)

年 龄	生 一 个	生 两 个	最好生男孩	男女无所谓
19—29	12	3	1	13
30—39	3	9	1	3
40—49	2	5	1	3
50—59	0	2	0	1
60—65	1	0	0	0

表九 对生育的态度(欧桥) (单位:人)

年 龄	生 一 个	生 两 个	最好生男孩	男女无所谓
16—29	3	16	2	11
30—39	0	14	1	9
40—49	0	4	0	1
50—59	0	2	0	0

看来,生育观的变化同农村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密切相关。老年人中虽然有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但是,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婆婆对媳妇施加压力直到生了男孩为止的影响也就相对减弱了。加上欧桥村的村办工业发展较快,不仅为本村积累了资金,而且为社员提供了福利基金,其中有一部分就用于社员免费医疗和老病残社员的生活费。此外,还组织老年人免

费到外地旅游。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保证，对子孙的依赖性也相对减少了。这一带针织工业比较发达，可以吸收不少女工，因此媳妇由原来在家里没有发言权，上升到夫妻共同掌管财权。地位的变化，使其少生育的愿望可以实现，国家计划生育也可以较顺利地推行。这两个地方一九八四年基本上都做到了一胎化。

(4) 礼仪形式态度的变化

传统上，农民对举办婚丧事十分重视，仪礼非常隆重，碧溪乡一个男青年结婚至少花四千元(相当一个中等水平工人四至五年的工资)，要办四、五十桌酒席宴请全村和村外亲友。家境困难的，不惜借款也要按礼仪举办。女方同样要花相似的钱办嫁妆，从全套新式家俱到家用电器、整套生活用品。这些礼仪在农村相当盛行，它已成为社会风尚，似乎不这样办就要遭到非议。带着这个问题，我调查了农民工对举办婚丧事的态度(表十)。

表十 对举办婚丧事的态度

你认为婚丧事应如何办	碧溪 (人)	%	欧桥 (人)	%
热闹些	4	8.0	17	39.5
应简化	21	42.0	14	32.5
只好按习俗办	23	46.0	8	19.0
其它	2	4.0	4	9.0

从上表看，碧溪农民工只有百分之八愿意办事热闹些，百分之四十二主张应简化，百分之四十六认为习惯势力太大，只好按习俗办事。而欧桥村却有百分之三十九点五的人主张办事热闹些。看来越在基层，传统势力越浓厚。同时，也说明习俗的独立性与经济基础有联系，但又不完全受它的影响，因为习俗的形成是几千年沿续下来的，有的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现阶段经济发展远比习俗形成为短，因此，它不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突变。追溯

表十一 家庭耐用品结构

项目	单位	碧溪镇(50户)拥有量	欧桥村(43户)拥有量
手表	只	137	132
自行车	辆	109	96
收音机	台	55	53
钟表	只	51	47
电扇	个	23	31
缝纫机	个	22	39
电视机	个	15	14
录音机	个	10	14
照相机	个	5	1
洗衣机	个	1	1
新式家俱	套	31	26
沙发	套	14	27

习俗的形成看来与其历史社会背景有关。越是初级社会，经济落后，人们越讲究人际关系，因为人们独立能力差，要依赖这些关系，获得最佳生存条件，而礼仪是人们用以联络发展人际关系的社会形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把人际关系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独立能力增强，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逐渐削弱，反映在礼仪上应该说也会逐渐

趋于简化。

(5) 生活方式的变化

上表反映手表和自行车在农村已非常普及，两地农户，百分之百拥有这两项耐用品，而且每户平均都有两辆以上自行车，碧溪镇农民工每户平均二点七只手表，欧桥村三点一只。这和七十年代初、中期，干部下放到农村，农民怀着异样的眼光看着干部手戴手表、脚骑自行车的神态已大不相同了。家用电器进入农村，这对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不能不是件大事。因为农民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才有可能改善生活条件。农民说：现在坐在家里可以知道天下事。电视进入农村，打开了农民的眼界，反过来农民又利用电视取得信息，用于生产。经济改革使城乡体系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现在的城乡关系，不仅工业品下乡，而且是技术、信息、科学下乡，不仅是农副产品进城，而且是工业品进城。这种转变不能不对农民产生影响，使他们能更多地接触到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旦生活条件好转了，就向城市的生活方式看齐。

(6) 时间观念的变化

碧溪镇抽查的农民工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感到时间不够用，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对事采取要抓紧办的态度。欧桥村情况也类似，百分之八十一的人感到时间不够用，百分之六十的人采取抓紧办事的态度（见表十二）。

表十二

时间观念与办事态度

对时间的看法	碧溪镇 (人)	%	欧桥村 (人)	%
不够用	35	70	35	81
有富余	9	18	2	5
无所谓	6	12	5	12
没回答	0	0	1	2
办事态度				
抓紧办	37	74	30	60
不着急	6	12	5	10
不冒尖	5	16	14	28
没回答	2	4	1	2

传统农民日出而耕，日落而归，他们没有计时的习惯，而是把一天分成几段。对他们来说，季节是重要的。农村出现商品经济后，农民在实践中感到时间和信息的重要性，农村出现了“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标语，它标志着农民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起步。

(7) 精神生活的变化

这两个地方的农民工在精神生活上有哪些变化呢？他们是怎样支配自己的业余时间的呢？

从表十三、十四看，这两个地方的农民工回家后，大多先干些家务和搞点副业，少数人干一些农活，剩下来的时间主要是看书和看电视。

在农业社会里，农村文化十分落后，农民文盲多。愚昧成为农民的一个特征，而且儒家的“士之本在学，农之本在耕”把学和耕分割开，形成几千年来农民认为学文化是城里人的

表十三

业余时间的安排

	碧 溪 (人)			欧 桥 (人)		
	首先做	其次做	第三做	首先做	其次做	第三做
家 务	29	9	2	21	3	0
农 业	2	1	0	0	4	0
副 业	8	7	4	13	6	3
看 书	9	12	6	7	10	6
看 电 视	0	11	17	1	13	10
串 门	0	1	5	1	1	0
上 茶 馆	2	0	0	1	0	0
体 育	1	0	3	0	0	5
其 它	0	0	2	0	0	6

事，农家人的本分是种好田。然而，责任制的执行，使农民看到要提高单位产量必需采用先进技术，科学种田。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欧桥村实行从小学到高中全部学费由集体支付。学生考取城市的中等专科学校和大专院校，村集体发给奖学金。许多地方还聘请城市大学教授、讲师在农村讲课。他们急需培训出一批农民知识分子，为建设现代农村做出贡献。

那么，现代农民工向往的是什么呢？也许表十四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表十四

意 愿 选 择

	碧 溪		欧 桥	
	(人)	%	(人)	%
学 习	12	24	9	21
工作有成就	9	18	6	14
富 有	7	14	5	12
生活愉快	1	2	5	12
家庭幸福	12	24	6	14
在城市工作	1	2	0	0
幸福晚年	0	0	0	0
子女孝顺	0	0	1	2
盖 新 房	4	8	4	9
找到好对象	2	4	6	14
其 它	2	4	1	2

上表说明，现代农民最突出的意愿是学习技术文化和精神上的满足。碧溪和欧桥占头三位的是：学习、工作有成就和家庭幸福。而欧桥竟没有一个农民向往到城市工作，碧溪也只有一个人。这是什么原因呢？用欧桥村农民的话说：“城市有的，我们乡下也都可以有。”何况他们的工资收入和住房条件比城市高得多。

意愿中带有传统观念的是子女孝顺，然而碧溪却没有人选择这一愿望，欧桥也仅有一人。这说明现代农民追求自身的成就，而对子女的寄托相对降低。加之集体富裕了，个人也能够享受到养老金，不需依赖子女。此外，从意愿中也可以反映出已经拥有的东西就不那么强烈再要了，例如，农民有了钱首先要盖新房，可是这两个地方对此反映不大，主要由于他们基本上都住上了新瓦房，欧桥的农民都已住上了两层楼的瓦房。

(8) 两代人的不同

工业乡和工业村代替了农业乡和农业村，在这一巨变中，两代人之间有哪些不同呢？

表十五 对老人的看法

	碧溪 (人)	%	欧桥 (人)	%
保守	8	13	9	12
经验丰富	18	29	16	21
太罗嗦	6	9	10	13
能吃苦耐劳	21	33	24	31
太节省	10	16	18	23

表十六 对年轻人的看法

	碧溪 (人)	%	欧桥 (人)	%
衣着看不惯	13	17	11	16
不能吃苦	10	13	13	18
不尊敬老人	3	4	5	7
溺爱孩子	8	10	6	9
思想开拓	14	18	10	14
思想解放	14	18	13	18
好 学	15	20	13	18

从表十八和十九看，比重大的主要是各自的长处，例如：老年人吃苦耐劳，经验丰富，年轻人好学，思想开拓、解放。中、老年人对年轻人最看不惯的是他们的衣着打扮，以及不能吃苦。中、青年人老年人最突出的看法是太节省和思想保守。也许这些特点正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的生活态度。

在农业社会里，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农民只看到土地分配的现象，而看不到土地单位面积会增长。因此，他们认为唯一可以增加财富的办法是克勤克俭，拼命地干，在这个背景下塑造了中国农民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德。而在商品社会里，年轻人看到只要有先进科学技术就可以多创造财富，增加收入。他们的看法是钱可以不断挣来，条件好了，也应讲究仪表美，因此舍得把钱用在穿上来美化自己。他们在干活上，不像老农那样拼体力，而是想办法提高技术减轻体力劳动。这两代人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他们的特征和时代的特点。如果说这是代沟，那么也许它是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反之，如果一代代人间不存在代沟，那就坏了，也许社会就停滞在某一点上。

三

在传统社会里，农业是经济的主体，农村往往集居着总人口的绝大部分。集镇通常把附近农村联结起来成为一个经济网络。近几年农村实行经济改革，在人多地少的江苏省，农村

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九八三年全省财政收入为七十二亿八千万元，其中农村乡镇工业提供的税收就超过十一亿元，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乡镇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资金向工业领域转移的过程，也是城市工业和技术向农村扩散的过程。这是中国农村由自给、半自给封闭式经济形态转向大规模商品生产的过程。过去从事小生产的农民，现在其传统思想、习惯、心理、行为和价值观无不受到冲击，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农民对土地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传统农民把土地视为唯一可赖以生存的条件。他们从狭隘的生活经验中认为一切生产资源就象土地那样有限，不会增长。乡镇工业兴起后，他们看到工厂占地不多，但是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使他们的生活日益好转，从实践中他们总结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经验，这是一条可以使农村富裕发展的经验，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条件。这条农民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改变了对土地的传统观念，从而在行为上改变了世代守住一小块家业的思想。专业户的兴起，出现了退责任田的情况，而另一些有农业技术的农户则承担了大片责任田成为农业专业户。农村向专业化、社会化的商品生产转化，使农民深感发展生产必须掌握科学技术，迫切要求改变几千年遗留下的愚昧、无文化状态。现在农村开始出现一批新型的有文化的农民，他们已不同于父辈只想保家业，而是以进取性姿态出现以期创造更多价值。这一批专业户、企业家懂得信息和市场的价值，敢于大胆投资经营。在这一批新型农民身上，传统农民意识开始逐步变化。

家长制是中国传统大家庭的产物。家长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精神和物质支柱，因此享有最高权威。家长有权决定家庭内部重大事务，例如经济问题、婚姻问题、生育问题等等。儿女则处于从属地位。媳妇是外来人，地位更低，往往要看婆婆脸色行事，因为她们用的、穿的都要婆家提供。集体化后近三十年，虽然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但年底分配主要是粮食和少量现金，由一家之长掌管。农村工业兴起，尤其是一九七九年以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青年男女被吸收到工厂做工，他们拿的是现金工资，从此家庭成员的收入情况起了变化，家长垄断一切也逐渐行不通了。媳妇自己有钱，可以自己买日用品，不需看婆婆的脸色了，从而婆媳关系也起了变化。尤其是农村小家庭的建立，老人退出了一家之主的地位，家长制也就大大削弱了。

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使历来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也受到冲击。尤其是农村办工业后，年轻人活动范围大了，接触的人多了，婚姻自主的要求也随之增长。欧桥村在五十年代男女不能晚上一起出去，六十年代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家庭允许子女出去看电影，七十年代初期，百分之三十的家庭仍由家长严格控制，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家长控制就行不通了。

传统大家庭的强盛的标志是人丁兴旺，因此，提倡早婚，认为“多子多福”。欧桥村这几年经济条件好了，计划生育也容易贯彻，基本做到一胎化。他们说：越穷越想生孩子，生活好了，也不想多要了。这正反映了经济、文化对生育的影响，反映了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人们要以现代生育观代替传统的生育观。在调查中，大部分农民工反映生男生女都无所谓。生育观的变化，又直接冲击着根深蒂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尤其是一胎化后，老一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将来是不是一定要女方嫁到男方来呢？男的可不可以到女方所在地落户呢？他们考虑得很周到，因为如果按生育性别看，几乎一半是独生女，嫁出去后，老人将十分孤单，他们是不愿意的。他们说今后将出现双方老人住在一个村里，那么年轻夫妇归属那一方呢？很可能会根据男女双方的实力而确定。这

个变化将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最大挑战。

土地观念的变化，封建伦理观念的动摇，意味着现代化的逐渐渗入。现代化这个名词有时被看作和工业化、城镇化名词等同，其实并不尽然。现代化社会也许可以解释为：将一个传统或半现代化的农民社会，经过工业化转变为一个技术化、经济均衡发展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出自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要求，有意识地放弃不符合环境要求的传统价值观，建立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形成新一代农民的性格。

中国土地辽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变化大一些，快一些，有的变化较慢。这篇论文选碧溪镇和欧桥村两个发展比较快的地方作为案例研究，虽然在今日中国并不是普遍如此，但从发展方向看，碧溪集镇和欧桥村的变化可能预示着广大中国农村发展的趋势，就这一点说，它们的变化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育民

哈尔滨改革与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报导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至九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改革与生活方式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与探索》杂志联合主办。来自十五个省市的七十二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共提交了四十五篇论文。

与会者就以下几方面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一、改革、商品经济及开放政策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包括生活方式中消费与消费观念的变化、国外生活方式的渗透与借鉴的关系、现代社会娱乐、开放式的社会交往活动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等问题。

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基本构成因素。包括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规范与社会实践、文化素质与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与生活方式等问题。

三、研究方法，涉及到生活方式的质与

量及精神生活的测量、社会分层与生活方式等问题。

四、生活方式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及哲学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

五、生活方式与生活管理、社会管理、生态环境的关系。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包括现代生活方式与法制的关系、城市生活方式的管理问题及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对培养教育青少年的作用等。

六、为了将生活方式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地开展下去，社会科学工作者比以往更加注重实际调查，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关于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家庭生活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妇女就业与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青年女工生活方式及离休干部角色生活方式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同样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

（王 颀）